

晚清维新派迁都思想之探析

柳青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维新派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提出了许多救亡图存方略,迁都思想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早期维新派还是以康梁为首的变法维新派都对迁都思想作了详细阐述。但是,由于政治环境、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维新派的迁都思想又存在多样性、复杂性,探析近代维新派的迁都思想对于深入研究维新派以及理解中国近代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迁都思想;晚清维新派;汤寿潜;康有为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2-0064-03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2.017

An Analysis of Reformers' Conception of Capital Relo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U Q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forward a lot of strategies for saving the nation from a serious crisis. Relocating the capital was one of the strategies of both early reformers and political reformer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environments, cognitive levels and so on, reformers' conception of capital relocation varied greatly. The exploration of reformers' conception of capital relo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study of reformers and comprehens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conception of capital relocation; reform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ng Shou-qian; Kang Youwei

一、定都北京:清朝都城选址概况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地理条件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南北方文化的差别,不同的朝代建都南方与建都北方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风貌,甚而带来不同的发展路径。“建都北方者,其规模常弘远,其局势常壮阔。建都南方者,……其规模常清隐,其局势常文弱。”^[1]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及北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文化的重心,把都城定在厚实、刚健的北方成为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定都时的首选。

“清王朝肇始于东北,崛起于辽东,定鼎于北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政

权。”^[2]^[14]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从此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选定国都时,安稳的政治环境、丰富的经济资源、厚重的文化传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清入关前经历了四京三迁,即兴京、东京、盛京、北京;一迁东京、二迁盛京、三迁北京。”^[2]^[11]北京作为清朝统治者最终选定的都城正是因其有着较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而近代列强侵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能否抵御外来侵略、保障王朝统治逐渐受到了质疑。

二、迁都救国:晚清维新派迁都思想的内涵及实质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族工业的起步、发展,

收稿日期:2015-01-18

作者简介:柳青(1990-),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维新派应运而生。他们针对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迁都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早期维新派的迁都思想

早期维新派是从洋务运动中脱离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一些观点成为日后变法维新派思想的渊源。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举国质疑,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等逃到热河,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北京作为都城战略作用被大大削弱,而中法战争等带来的边疆危机也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早期维新派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汤寿潜,他所著的《危言》一书提出了迁都西安的观点。在《危言》的首篇《迁鼎》中,他指出:“俄人攘我尼布楚,宰我库页岛,占我混同江,近且营铁路于锡伯利亚,闻将以五年竣工,由彼得堡止半月可达珲春。建瓴之势成,肩背之地寒矣。又自海禁大开,泰西轮船飙驰霆击,天津实当其冲,向所谓一面制敌者今且转而受敌,以视开国形势,不亦今昔殊状而安危易轨哉?”^①日益严重的边境危机是汤寿潜主张迁都的重要原因。俄国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同时又在西伯利亚修建铁路,更加便于其入侵中国东北;而海禁大开使得列强可由天津直接登陆中国大陆,威胁与天津相邻的京城的安全。更难能可贵的是,汤寿潜意识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东顾之忧,旦夕间事也。”^②若迁都西安,则能“居高御下,尚可运筹而徐理”^③,

的迁都思想以康有为提出的迁都思想为主,维新变法期间先后提出迁都西安、上海,甚至在“戊戌变法”失败若干年后的民国,康仍然不忘“迁都救国”,主张迁都济南。本文主要论述晚清维新派的迁都思想,对康迁都济南的思想不作分析。

1. 迁都西安以定天下之本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震惊全国。1895年春,在京会试的举子康有为起草了《上清帝第二书》,与其门生梁启超联合其他举人签名上书清帝,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上书中,康有为痛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4]70}而应对这些列强瓜分的狂潮,只有“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5]。除此之外辅以富国政策,才能挽狂澜。其中迁都是安定国本的基础政策,是其他措施以及变法实行的重要政治保障。“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蹶,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4]70}康有为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东部沿海遭遇列强前所未有的威胁,加之《马关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大

“内泄外沓,文宴武嬉”^④,北京作为京师已有二百多年,朝中形成了数量庞大、错综复杂的顽固守旧官僚势力,阻碍改革的进行。只有迁都才能打乱原有的政治集团,为抵御列强、自立自强提供稳定条件。“九鼎既迁,耳目一新,志气一振,在上革浮靡之供亿,求弼亮之左右,删苛细之科条,与民更始;在下则磨砺其廉耻,浚沦其性灵,毋情见势绌而尚以西法为忌讳,毋玩物丧志而尚以帖括为专门,破除常格,可富克强”^⑤。

综合来看,“汤寿潜主张迁都的最主要原因,是着眼于当时的‘地利’,避开不利的国际环境,以为维新变法争取一个适宜的外部条件”^[3]。汤寿潜的迁都思想实质是他改革措施的政治保障,同时他对当时国内特别是京城的政治生态进行批判,并作为迁都的一个重要理由,为不久以后的戊戌维新派改革思想提供了借鉴。

(二)变法维新派的迁都思想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派继承和创新了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并把维新运动付诸于实践。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迁都被视为推进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条件。变法维新派

地侵犯京城。“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4]70}西安地处中原腹地,北邻渭河、黄土高原,南靠秦岭,易守难攻,战略位置十分优越,而且历史上西安多次被作为王朝都城,历史底蕴深厚,除北京外是选作首都的理想之地。“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4]70}迁都西安可以更好地抵御如日本等列强的武力侵略,保障王朝安稳。至此,康有为从战争地理角度分析了迁都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康有为还把视线转向了对北京腐朽、守旧的政治环境的批判。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讲道:“夫京都建自辽、金,大於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圯,间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洩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宜舍燕蓟之旧京,宅长安为行在。”^{[4]71}在康有为看来,北京自辽、金起就一直是王朝都城,历经千年,无论是城中的宫殿、建筑,还是人文、风气都已暮气沉沉,丧失活力;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集团错综复杂,守旧势力强大,这种形势对即将要实行的维新变法非常不利,只有迁都

① 汤寿潜著《迁鼎》,见《危言》第一卷。

西安,革新政治环境,才能减少变法阻力。

2. 迁都上海以行新政

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变法以日、俄两国改革为参照,一开始维新派就遇到了许多阻力。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来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在变法后期,康梁等人明显觉察出慈禧太后等要收权反击的动机,于是把挽救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效仿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中,明治天皇把都城从原来封建贵族的大本营京都迁至受列强冲击较早、政治经济发达的江户,从而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康有为受到日本维新成功经验的启发,看中了上海这座年轻、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划定上海为通商口岸,使其由一个江南小镇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相比于京师,上海没有太多守旧顽固力量,少了许多盘根错节的官僚群体,更适合新事物发展。随着顽固派日益咄咄逼人,康有为正式向光绪帝提出迁都上海的主张。在其所著的自传《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讲道:“又请迁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数十人,从办事,百官留守,即以弃旧京矣。”^{[6]130}对于迁都上海的理由,康有为予以详细说明,与之前主张迁都西安一样大致分为两方面,即地理位置与政治环境。地理位置上,“力言旧京、旅、大、胶、威门户尽失,俄人顿重兵于旅顺,扼吾之吭,无可守矣”^{[6]130}。甲午战败,俄国强占东北,北京作为都城在东部与东北部面临列强

成为必要,从而减少变法阻力。首先,北京城内的自然条件已不适宜统治者居住。“又北京连年水灾,城崩屢次,尘土盈天,泉恶脉坏,王气已绝。”^{[6]131}其次,北京昏暗腐化的政治弊病、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根深蒂固,加深了民族危机,其中守旧顽固势力严重阻碍了维新运动。“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则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礼,种种皆亡国之具,不易扫除,非迁都避之无裨、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6]131}清扫顽固势力,减少变法阻力是康有为主张迁都上海的最重要原因,上海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北京所不具备的优势。只有“居于上海通达之地,以控御天下,其于新政最便”^{[6]131},新政才能顺利施行。

三、一脉相承:晚清维新派迁都思想之对比

维新派的迁都思想尽管在历史阶段、代表人物、具体观点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但迁都思想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他们救亡图存政治方略的重要内容。

迁都思想所提出的目的都符合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目标。汤寿潜与康有为分别提到了中国面临的边境危机和列强瓜分危机,尤其是俄、日两国的侵略野心更令“迁都救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汤、康二人同时注意到了京师的种种政治弊端、战略上不利的地理位置及这座城市的衰微,指出北京已经不适合作为当时的国家都城,迁都迫在眉睫。值得注意的是,汤寿潜与康有为都注意到京城的政治环

境不利于新政改革的开展,迁都是打击朝中顽固势力,为变法清扫障碍的重要途径。这也反映出早期维新派与后来变法维新派在变法维新上共同的政治诉求。

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早期维新派与变法维新派的迁都思想又存在一些差异,即使是康有为本人的思想,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期间也有很大区别。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思想是指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维新变法还未发展为潮流,英、俄等列强加速侵华,汤寿潜主要从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国际环境的角度来分析迁都的重要性,即迁都可以创造“地利”,对抵御侵略、打压顽固派更加有益,从而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内外条件。甲午战后维新思想迅速传播,维新派的力量也逐渐壮大,维新变法被推向高潮。康有为的迁都思想除了战略位置上的考虑,更加侧重迁都为变法服务。“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鼓励士气、迁都西安、练兵再战,为的就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又主张迁都上海,最主要的原因是京城压抑、昏暗、守旧的政治环境严重妨碍甚至会扼杀变法,只有更换新的都城,打乱原有的官僚体系,才能打击反对维新的顽固派,才有可能挽救变法运动。

四、难以实现:晚清维新派迁都思想的现实效果

无论是以汤寿潜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的迁都思想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派的迁都思想都只是停留在理

想和空想层面,并未付诸实施。

早期维新派主要脱胎于民族工业刚刚起步的洋务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未能发展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思想上也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迁都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汤寿潜一人。而且这一时期大清刚刚经历“同光中兴”,国内人民斗争暂时“平息”,中外关系也比较“缓和”,因此,统治者并未重视汤寿潜的迁都主张。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相比于早期维新派汤寿潜,前者提出的迁都救国主张更顺应时代潮流,内涵也更加丰富。然而变法维新派侧重把迁都作为打击封建顽固派、扫除变法维新阻力的途径,这必然触动了实际掌权者的利益。“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又由之前的迁都西安转向了迁都上海。上海与北京相比没有丰厚的历史底蕴,上海又近海,在当时不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更何况上海的政治经济都在帝国主义把持之下,如果迁都于此,恐怕仍无法摆脱受列强威胁的局面,而这正是康有为力主迁都的初衷”^[7]。这些反映出变法维新派迁都思想的不成熟及其政治观点的不坚定。

尽管维新派的迁都思想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纳,但是它带来的历史影响却是深远的。民国初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便十分重视首都选址,以至于意欲把定都南京作为牵制袁世凯北洋势力的重要手段,这无疑多少受到了晚清维新派迁都思想的启发。

(下转第102页)

参考文献:

- [1] 闫华.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
- [2] 郑雪. 健康人格的理论探索[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141-147.
- [3] 刘翔平. 给自己注入积极基因[M]. 北京: 中国经济出

版社, 2005: 13.

- [4] 刘翔平. 当代积极心理学[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 [5] 王滨. 积极情绪对健康人格作用机制的探讨[J]. 河南大学学报, 2006(5): 153-156.

(责任编辑: 夏玉玲)

(上接第66页)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势论[M]//饮冰室合集(第二册): 第十一卷. 上海: 上海中央书店, 1935: 244.
- [2] 白洪希. 清入关前都城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7.
- [3] 戚其章. 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发展论——兼论汤寿潜的早期维新思想[J]. 中州学刊, 1995(2): 100-106.
- [4]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二书[M]//康有为诗文选. 广州: 广

东人民出版社, 1983.

- [5] 戚其章. 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70.
- [6] 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M]//戊戌变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 [7] 倪侃. 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迁都思想述论[J]. 历史教学问题, 2001(3): 19-22.

(责任编辑: 白丽娟)

(上接第98页)新闻中的叙事通过情感的传递丰富了内涵。

新闻中叙事注重节奏、色彩的调整, 充分体现出新闻叙事的美感。叙事的审美过程: 生理快感—心理快感—精神快感。如何把握叙事的节奏, 调整叙事的节奏是实现审美过程

口语化的真实表达, 所以, 互动叙事代替了单向表达。

第三, 多媒体技术叙事。图片、音视频、三维动画都承担起了叙事功能, 并且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文本线性叙事被新媒体功能叙事所替代, 内容比例减少, 顺序被打乱, 叙事呈

叙事的节奏, 人物之间、新闻内外的情感通过这些变化进行了通畅的交流。

四、叙述路径的非线性

原有的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逻辑、演变而确定的新闻传统叙事被超链接、背景新闻、相关新闻事实材料所代替, 非线性叙事成为“主力”^[5]。

第一, 非限定性叙事。传统新闻叙事过程中, 文本的单一叙事要求内容限定范围, 范围限定接收。记者为了克服这种限定性, 会主动在新闻文本中增加新闻背景材料, 满足受众需求。而媒介融合过程中, 超链接实现了新闻背景材料、相关新闻内容的无缝链接, 读者可以无限阅读下去。这样, 新闻不再是以单一的形式存在, 而是无限的多层次叙事同时存在、同时进行、同时发展, 只要受众愿意,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单一文本叙事中无限阅读下去, 记者也无需因为新闻中缺乏相关背景材料而苦心搜寻。

第二, 多角色参与叙事。新闻叙事应重点关注新闻事件内外的人物、矛盾、影响, 所以, 以此时的新闻事实为原点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的事实材料都可以进入到叙事中。在传统新闻报道面前, 受众往往是被动接受信息; 而在媒介融合背景下, 新闻中对于受众观点、评论、争议内容的及时吸收, 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对人称、视角、语言的要求与限制, 甚至允许

五、结语

随着新闻报道手段、方式的不断更新与变化, 新闻叙事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新闻受众的“发声”成为新闻叙事的一部分。媒介融合的技术革命集中于近年来的多媒体、互联网时代, 它对新闻理论发展产生的颠覆性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新闻实务操作过程上。这种由外而内的技术革新演变成由内而外的理论革命, 新闻传统叙事所依存的传播技术、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价值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新闻叙事在模式、策略、内容、路径上的变革, 并将新闻叙事推向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刘冰. 新闻报道写作: 理论、方法与技术[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2: 89.
- [2] 咎辉. SEO实战密码[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86.
- [3] 黄栗. 深度报道栏目的品牌研究——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为例[J]. 中国传媒科技, 2012(22): 46-48.
- [4] 冷冶夫. 纪录片创作要有“兴奋点”[J]. 新闻记者, 2004(11): 32-34.
- [5] 王晓斌, 欧阳照. 新媒体时代下新闻叙事中叙述的创新[J]. 青年记者, 2013(35): 34-35.

(责任编辑: 夏玉玲)